

从明鲁王府看兖州礼乐文化变迁



曲。虽然中和韶乐承袭自唐宋，但在乐队组合和用乐承载人员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国家凶礼包括吊唁总叙遣使赙赠、各府水旱虫灾遣使劳问、皇后陵寝、兴宗帝后陵寝、睿宗帝后陵寝、皇妃等丧葬、皇太子及妃丧葬、诸王及妃公主丧葬等。宫廷礼乐管理机构负责整个礼乐系统的运行，用乐承载人员则负责音乐活动的开展，王府用乐则在宫廷用乐的指导下进行。明初设立的宫廷用乐管理机构主要有太常寺、教坊司、钟鼓司等。教坊司承担了礼乐的多重功能，还承载了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音乐。

它掌管的宫廷用乐内容较多，不仅包括礼制仪式中使用的礼乐内容，还包含非雅乐的内容，承载相关用乐的人员是由乐籍制度统一管理的。礼制用乐的承载人员应承担整个礼乐系统中的雅乐与俗乐。在鲁王府中，虽然也有乐舞生与乐户，但他们的选拔并非由宫廷分配，而是遵循礼制规定，由各地府县衙在当地进行选拔调配。元代的礼乐户是专门承载雅乐的群体，到了明代则改称为乐舞生。乐舞生以户籍加以管理，归属于宫廷、王国、地方官府三处。乐户与乐舞生同为礼乐制度下的乐人群体，但身份低贱，并且承担的用乐类型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

明代乐户和乐舞生在宫廷、藩国和地方官府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礼乐制度的规定，宫廷和王府都有乐户参与音乐活动。乐户由乐籍制度管理，不仅在宫中活动，还会被送到明朝的藩国传授音乐并进行教学，这表明乐户在属国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乐舞生一样，乐户也是传播礼乐思想和政

治观念的代表。他们完成王府、藩国和地方官府的音乐教化任务，保证了宫廷的权威性，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乐户的流通不仅是为了确保宫廷礼乐在各级机构中得以准确使用，也是为了保证藩国地方官府的音乐基础，这种礼乐的统一也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维护。

因此，乐户的角色不仅包含了礼乐的传承，还蕴含着政治色彩。在明代鲁王府的用乐礼制仪式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些许变化，但其宫廷以礼节制地方的核心观念并没有改变。整个明代的王府音乐仍然具有一定的承继性和一致性。王府用乐包含了礼乐与俗乐，上承宫廷用乐，下接地方区域的礼俗文化，对地方礼乐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在雅俗用乐礼制方面，郡王的用乐范畴中没有用于王府礼制仪式的雅乐。除非得到特殊恩赐，大多数郡王在迎接诏敕这种场合时，只能就近向地方官府借调乐户，临时用于王府礼制仪式的俗乐。

在用乐承载人员方面，郡王也没有朝廷拨给的乐工，也不允许其擅自奏讨。鲁王府的乐舞生和乐户虽然同为与中央朝廷的用乐体系相接的用乐承担者，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整体而言，明代的宫廷和王府用乐体系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适应和影响地方礼乐文化。王府中的乐舞生通常身份较高，如生员或道士，有资格在官府任职。他们负责举办王府内的雅乐表演，但受到了严格限制。由于他们的出身并非职业艺人，因此在王府举办雅乐时，只能按照太常寺乐舞生的教学内容进行表演，难以对鲁王

贴青龙的由来

第二天天不亮，乾隆就起来了，因为常年养成的习惯，到点就醒。乾隆起床后，又不上早朝，也没有多少奏折可批，闲着没事干，就与出巡侍臣、《四库全书》的主编纪昀（纪晓岚）一起吟诗作对。君臣二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一问一答，正高兴的时候，隐隐约约地听见远处传来阵阵迎亲的鼓乐声。当时乾隆就想，不对呀，按皇历今天可是个不宜婚娶的凶恶日子，怎么还有迎亲的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乾隆皇帝和纪晓岚两人着便装离开行营，迎着迎亲鼓乐的方向走去。不说御林军急忙悄悄不远不近地跟随其后进行护驾，单说乾隆和纪晓岚两人摸出村后，功夫不大就看见过来一队抬着花轿，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君臣二人往旁边一闪，让过迎亲的队伍后，突然发现轿子后头跟着五个身穿白大褂、头戴孝帽子、手拿哭丧棒的人。这下乾隆爷来气了，心想，人家迎亲是大喜事，你们几个身穿孝服跟在后面干啥呀，这不是娶媳妇打幡—跟着瞎凑热闹嘛！一准不是什么好东西，看朕的家伙吧，顺手就把手中的扇子对着那五个穿孝服的人扔了过去。乾隆是马上皇帝，虽然不能说武功超群，有多少高招和绝技，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练家子，身上还是很有些功夫的。况且，当时又是在气头上，自然是下手狠用劲足，所以，这一扇子打得既快又准。说时迟那时快，没等那几个穿孝服的家伙反应过来，乾隆爷的御扇“嗖”的一

下就飞到了，正好打在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家伙的脑袋上，把头上戴的孝帽子都给打歪了。就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子，那五个身穿孝服的家伙立马全不见了。

纪晓岚上前帮乾隆皇帝找回御扇，边递御扇边小声请旨问下一步怎么办。乾隆用手一指已走远的送亲队伍说，跟上他们，看看还会出什么幺蛾子事，也顺便打听一下，究竟是哪个不着调的风水先生给这家喜主看的日子。

君臣二人尾随着送亲的队伍往前走，一直跟到邻村娶媳妇人家的门前。这时，乾隆也感到有些累了，见大门旁边有个高马扎，一屁股就坐了上去。纪晓岚站在一旁侍驾，两个人谁也不说话，静观事态发展，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一对新人都拜完天地，礼成人入了洞房，就要开喜宴了，也没有发生什么幺蛾子事。乾隆皇帝觉得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就起身想走。没想到这时婚庆管事的陪着喜主来到他跟前，恭请他和纪晓岚两人进家赴宴喝喜酒，而且把他们君臣二人安排在了首席，并由主人亲自作陪。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乾隆皇帝起身再次向主人道喜，并将御扇送给主人，作为一对新人的新婚贺礼，然后询问主人是找的哪位风水先生给看的吉日。主人起身回答，不瞒您说，找的这个看吉日的先生，可是个风水大家，神机妙算，号称小诸葛。虽然按皇历今天确实是个不宜婚娶

府雅乐的表演风格进行元素创新。

与之不同的是，在鲁王府中的乐户来自兖州府的地方官府。明代王府乐户的主要来源是王府所在封地的地方官府，而鲁王府中的乐户则源自兖州府的地方官府，王府乐户的重要特征就是接地气。从兖州地方官府选拔而来的乐户不仅掌握了明代朝廷体制下的用乐规范，还可以将兖州地方的音乐风格和新创音声带入到鲁王府用乐之中。在教坊司体系下，乐舞生负责办理王府礼制仪式的雅乐，而乐户则负责办理用于王府礼制仪式的俗乐、王府卤簿仪仗用乐，以及与礼乐对应的相关俗乐。鲁王府用乐与兖州民间礼俗相衔接。明代礼乐制度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上下贯通性的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尊崇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以礼来教化百姓，规制官员。因此，明代礼乐不仅对宫廷用乐仪式作出规制，对地方王府和府州县用乐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以确保达到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政治目的。民间礼俗是国家礼乐文化的下移，是国家礼乐世俗化的体现。在国家礼乐文化下移的过程中，王府起着重要作用。明代王府遍布各地方，为保证王府用乐的顺利进行，宫廷对其用乐的礼制仪式作出规定，一应乐器祭器均由宫廷拨赐，但王府用乐的承载人员却由地方调派，特别是乐户。如果说王府是连接宫廷与地方的纽带，那么王府的官署乐工则是连接王府与民间的纽带。

在调派至王府之前，地方乐户多服务于民间，对民间音声与娱人的俗乐尤为擅长。调派至王府任职之后，乐户不仅会学习并掌握宫廷礼制下的王府用乐规范，也会将地方的音乐风格与新创音声带入王府，再将王府的礼制用乐带入民间。王府的乐户或乐舞生在民间进行音乐活动时也是民间百姓对国家礼乐不断认同的过程。鲁王府礼乐文化对民间礼俗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自古以来，乐户或乐舞生会通过学习王府的礼制仪式，并进行再次创造，以使音乐更贴合百姓的喜好和需求，同时去除一些不适宜民间的仪式。这种行为使宫廷礼乐文化在民间得到认同和传承，从而对民间礼俗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明代开国以来便重视儒家文化，推崇以礼治国。洪武年间对各地王府的一应礼制作出规定，祠庙、寺观也属于王府礼制规定之中。鲁王府乐工改编后传承下来的柳子戏、济宁地区蓬勃发展的鼓吹乐，以及鲁王修建祠庙而产生的民俗文化都是鲁王府推动兖州民间礼俗文化发展的有力证据。总结起来，明代鲁王府礼乐文化作为中央分封到兖州的地方政权，对兖州民间的纽带桥梁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有宫廷赐乐带来的一致性又有与民间衔接造成的差异性。

兖州由于具有特殊区域位置和险要的地理形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代都派重兵驻守，成为鲁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中心。因此兖州的金融业、工商业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明清时已较繁荣。1912 年 11 月，兖州府火车站建成，津浦铁路及济济(宁)支线同时竣工通车，客观上为兖州地区的经济振兴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一次机遇。兖州地区的一部分开明人士，纷纷从事经商，把资本投向金融业、工商业，引发了兖州及周边地区经济的一度兴盛。据史料记载：民国初年，城区开设各种商铺已达 508 家，主要集中在老东门里大街（今中山东路）、南门里大街（今御桥南路）、酒仙桥街、南岗子街及火车站附近，从商人员已逾五千。至 1912 年又有瑞祥、同昌（经理王春宣）、同义（经理甄奎义）等三家较大的钱庄银号开张及 20 余家中小型钱店先后营业。

瑞祥钱庄位于老东门里大街与北顺城街交汇处的西北隅，有门头房五间，柜屋三间及庭院一处。员工八人，勤杂工三人。张玉华（字梅园）任经理，初投资 2000 余吊铜元，后发展至 3000 余吊（当时流通的货币是铜元，每“吊”为铜元一百枚，约合 1000 余块银元）。经营买卖金银、兑换银元、存款、贷款等业务，并开发银票。紧邻的文具店、茶叶店、玉湖春浴池（另外还有两个浴池：一个在西御桥头路东，一个在中御桥）也为张氏投资，同时兴建文化娱乐场所，在老东门外及西门里建了两处戏院，“粹和舞台”即为其一。

张玉华（1870—1956），祖籍兖州城西五里庄村，四岁时其父从军远走他乡，随母住在曲阜姚家。年少时在一家私塾里当学童并读书。十二岁随母迁回老家兖州北顺城街路西居住，投奔其父的世交开办的武校习武，勤学苦练，名列前茅，又因颇识字，被新任兖州镇台选中，留在镇台衙门供役。后镇台田恩来病逝，曾护送田的灵柩归至老家安葬。返兖后辞掉官职开始经商，先后做日用百货、营销茶叶等生意，并在武汉设立采购货钱一处。

20 世纪初，德（国）士古、美（国）孚油等国外石油大公司的产品输入我国，玻璃工业又开发了照明产品、汽灯、避风玻璃罩灯具应运而生，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照明靠植物油、蜡烛的历史，引发了照明业的一场改革。张氏抓住了这次商机，于 1903 年底在兖州开设了煤油、汽油及新式照明灯具营销处，并利用兖州的独特地理优势，与周边区县设立联营经销点，历尽六、七年的谋划奔波，取得了从事商业运作初级阶段的资金积累。

1908 年前后，津浦铁路和济济（宁）支线、兖州府火车站相继开工兴建，大批修建铁路工人及家属涌入县城，商人云集，住房紧缺，张氏又把资金投入房地产开发。以北顺城街老家为依托购地十余亩，兴建四合院式的出租院落十余处，结果被抢租一空。服务业、娱乐界需求也水涨船高，又应时随需兴建了三处浴池和两个戏院，成为民国初年兖州发展服务业、娱乐界投资最多、最早的人士之一。这些房产建成后均供出租，已不经营。

随着辛亥革命的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得到传播，社会经济的运转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和提速，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量逐日扩大和发展，引发了兖州金融市场的一度兴盛，典当业和银号钱庄数量和规模也随之增多扩大。张氏审时度势，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创办钱庄，缺少财会人员，派专人到银票发达的山西高薪聘请来当“掌柜”。经理亲自考选店员，审视身体状况，要五官端正、口齿清晰、能写会算，尤善于用珠算。介绍人需如实说明应聘者的品德及家庭状况，并担保画押。店员要学会识别金银及票据真伪的能力，嘴稳手稳，眼脚勤快，营业时间禁止办私事及谈笑打闹、吸烟酗酒、吃零食、打瞌睡。成家的店员可每十天轮流回家一次，未婚者也可回家一次换衣探视父母。凡自己的熟人来办理存贷款，不准自己收、支钱票。晚间店员轮班守门护夜，生人敲门要请示师傅，应准后方可开门。盘点结算一年两次，年中、年终各一次。盈亏只有经理、掌柜（会计）知道。中晚饭由馍馍房送面食，两菜，一荤一素。每月逢一、六及年节改善生活，每顿四菜一汤。在管理制度方面，既有传统的陈规旧俗，又有了一定的改进和拓展。

聘请来的山西掌柜初来还较勤谨，经营初见起色。但由于经理疏于监管，时局不稳，市场变化又快，掌柜从中作梗，虚开银票、套取银元，中饱私囊，一年后盘点亏损较大，只好又从其他营销收入中来填补亏空，稳定信贷支付能力，防止了市场波动，避免了当时极易产生的挤兑风潮。后辞退了山西掌柜，改由其长子张锦堂来任董事，张氏也来督导，经营日趋好转，营业额日渐增多。至 1920 年前后，为瑞祥经营最好的时期，流动资金最高近六千多吊铜元（约合 2000 块银元），成为当时城内最具实力的银号之一。

1923 年后，政局越发混乱，军阀林立，各自为政，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1924 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入关占山东，强行发放“奉票”、“军用票”，并陆续发行山东银行票，逼迫商民使用。军阀官兵用奉票纸币套兑银元，不从即抢劫一空。连县府出的县库流通券，加之一些既无资金来源又无实物抵押的奸商，大量空头纸票，聚敛货物，囤积物资，市面上完全被各种纸票所占据，等于拿着货物兑换废纸。瑞祥钱庄也和多数民族资本银行一样，以致无力兑现，造成挤兑风潮迭起，难以维持，闭歇营业。张氏 60 岁前所创办的家业在风雨飘摇中损失殆尽。1930 年起，张氏再从小本生意做起，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创业，陆续赎回了部分抵押的房地产。

日伪统治时期，侵略者重兵驻扎兖州，宪兵队、便衣特务、伪警、狗腿子，招摇过市，敲诈勒索，强制发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钞，对我国经济进行残酷的掠夺，商业资金、社会资金都受到严重的损耗。一些商家便闭门歇业，以保持民族气节，不与敌伪为伍。瑞祥钱庄张氏、同义钱庄甄氏等诸多商家，复购田园数亩，足不出户，家人相安，颐养天年。

兖州瑞祥钱庄事略

张燕峰 甘益哲 整理